

李松睿——著

书写

『我乡我土』

地方性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小说

上海人民出版社

李松睿 著

书写

『我乡我土』

地方性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小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写“我乡我土”:地方性与 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小说/李松睿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ISBN 978-7-208-13704-2

I. ①书… II. ①李… III. ①现代小说-小说研究-中国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62313 号

责任编辑 薛 羽

装帧设计 范昊如 周小桐

书写“我乡我土”

——地方性与 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小说

李松睿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3 插页 2 字数 271,000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3704-2/I·1513

定价 48.00 元

序 言

吴晓东

李松睿的著作《书写“我乡我土”——地方性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小说》论述的是20世纪40年代一个有意味的文学史现象，“即这一时期的作家、批评家无论身处何处、面对怎样不同的政治情势，他们在构想一种超越‘五四’新文学弊病，适应战争环境的‘理想’文学形式时，都特别强调以地域风光、地方风俗以及方言土语等形式出现的地方性特征的重要性，并纷纷选择以这一特征来塑造文学作品的感性外观”。本书的核心问题意识即来源于此，作者在书中试图追问的是：“为什么20世纪40年代的作家、批评家会对地方性问题如此念兹在兹，并在文学表达中将其放置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他们在加强其作品的地方性特征时，究竟想要表达些什么？地方性特征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到底发挥着怎样的功能？”

我首先看重的正是松睿在研究过程中表现出的这种逼问核心问题的自觉意识。这部《书写“我乡我土”——地方性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小说》即表现出他善于从一个具有本源性的问题出发，在

充分进入历史语境，掌握与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同时，建构具有一定的整体性研究视野的学术能力。本书对地方性论题的研究，也因此不仅提供了中国文学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战争环境中特有的历史风貌，也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某种具有整体性特征的历史面向；松睿的这一研究也由此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总体性叙事格局中具有结构性意义的组成部分。

松睿在这部已经成型的著作中有着多重的方法论的自觉。这种自觉的表现之一是对主题学研究的反思：“在主题学的研究中，研究者会特别关注某类文学主题在文学史发展脉络中不断的复现与变奏，并根据这些长时间‘盘踞’在创作实践中的主题，梳理出作家的思维方式、其在文化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等一系列问题。”“虽然这类主题学的研究能够得出一些让人深受启发的‘洞见’，但由于在方法上它总是关注所谓‘异中之同’，因而很难为我们回答在特定历史时空下某些主题被特别强调的真正原因。也就是说，在主题学的研究范式下，我们没有办法具体回答为什么 20 世纪 40 年代的作家、批评家会特别重视文学作品中的地方性特征。”正像松睿在本书的导论中所表述的那样，他进一步摒弃的，还有诸如探究意象或母题的研究路数。在某种意义上，本书构思和写作最难的部分其实是为拟设的特定对象找到既吻合于对象也属于研究者自己的思路，用松睿自己的话说，即“寻找一种最为合适的方式对本书的研究对象进行讨论”。而松睿所要处理的 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文学，其挑战性在于，在长时间的抗战历史阶段，中国版图上的三个地区的划分，为此一时期的文学图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三个地区虽然也分享着某种相似的历史氛围、文艺思潮和诗学特征，但差异性则是更为主导的倾向。因此，松睿所选择的合理的策略，是直面差异化的政治形势和言说环境。对 20 世纪 40 年代文学的地

方性问题的理论言说创作实践按照区域划分，并分别进行论述，进而兼顾解放区和国统区延续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相关问题，就成为作者选择的相对稳妥的方案。而在我看来，真正表现作者的成熟之处的，还在于松睿清楚地意识到：“论述的结构则只是帮助研究者更为方便的讨论问题。在有些时候，‘得鱼而忘筌’式的研究态度或许最为合理。”“论述的结构”其实是更有助于还原和体贴历史的本来面目而已。而所谓的“得鱼而忘筌”，也许不仅仅是一种研究态度，如果真的能够做到，甚至可以称为一种让所有研究者都心向往之的境界。

“地方性”视野，在松睿的研究预设中，既是理论表述和批评实践，又是重释作家作品的一个出发点。本书因此既是一部具有宏观历史描述和整体理论探索的文学史研究，同时又是偏重于作家和文学作品的再解读的著作。本书的前身是松睿的博士论文，作为他的指导教师，在松睿最初进入这个课题的时候，我曾经担心借助于“地方性”的视野，会离析出一些虽不缺乏共性特征，但也可能失于大而无当的宽泛结论。而随着松睿对这个课题的深入，最后阅读松睿提交的博士论文的完整定稿，我意识到当初的担心是多余的。本书处理的议题虽然称得上是现代文学的宏大叙事之一种，但松睿选择的论述方式却相当具体细致，对历史细节的把握以及对作家作品个案的详尽阐发，都使这个论题得以深入而细腻地展开。借助地方性问题视角，本书洞见了以往文学史描述尚未充分触及的一些创作面向，重新阐释了20世纪40年代的不同地域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分析了老舍、赵树理、周立波、丁玲、师陀、梁山丁等作家的小说。而本书更为值得重视之处，或许正在于对上述这些作家进行独特阐释的环节。我的阅读感受是，一种具有洞察力的兼及批判理论以及文学史视野的观照，是怎样能够照亮以往不被我们充分察

觉的文学史现象，正像借助于一个探照灯，松睿为我们烛照了以往研究视野中一些晦暗不明的角落。

因此，对理论和创作的兼顾，构成了本书的双重写作线索。据我对松睿的了解，他的研究才秉是在理论探究和文本分析之间形成了一种均衡性。这种均衡性也是一个研究者具有未来性潜力的表征。松睿既喜欢研读理论，有比较执著的理论热情，同时又能把理论与文学史描述以及文本解读结合，形成的是一种探寻“理论的历史性”的自觉意识。所谓“理论的历史性”，在本书中表现为理论与历史以及作家创作之间的一种辩证的关联性。按照本书作者的理解，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的一大特征，是“小说家的确受到文艺理论家们的巨大影响，但其作品对地方性特征的呈现却并没有完全按照理论家的指导进行，而是呈现出异常复杂的面貌。”“正是这些作家的小说创作实践，才真正激活了地域风光、地方风俗以及方言土语等地方性事物在文学创作中所具有的潜力，并使得小说形式因大量吸收地方性因素而发生了改变。”这使作者意识到，本书的讨论倘若单纯局限在文艺理论层面上是不够的。引入对小说创作的分析，特别是探究小说形式因地方性特征的纳入而发生的变化，借以全面展示地方性特征对于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的意义，成为作者所必然选择的研究路径。在我看来，小说堪称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具魅力也最具丰富的可能性的文学体裁，是讨论地方性书写的最有效也是无法绕过的形式。也恰恰在小说这一更为复杂的文学形式中，层积着理论与历史以及作家创作之间更为内在化的关联。对这种内在的历史关联性的考察，在第四章《赵树理：地方性与解放区文学》中体现得最为精彩。本书作者发现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地方性特征存在着一个由隐到显的过程，当解放区的文艺理论家可以轻易地辨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作品的地方性特征的

同时，却无法指认赵树理小说中所蕴涵的也许更不失为鲜明的地方色彩，造成这种错位的根本原因在于解放区的文艺理论家是从阶级性的价值尺度来理解文学的地方性特征。由此，作者揭示了解放区文学所具有的堪称独特的历史特征，即文艺批评与文学创作之间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因此，对解放区文学中的地方性问题的研究，就不能单纯讨论具体的文学作品是如何表现出地方性特征的，而只能在批评家的言论与作家创作实践的相互关系中，去理解地方性在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发挥的功能。”这就真正建构了理论和创作的具体的历史关联性，也凸显了本书作者对赵树理、丁玲与周立波的小说进行的重释的工作也是对历史和政治地图的重新绘制，这种重绘的过程，正是创造性研究的精义所在，它意味着研究中的具体问题意识的生成正隐含在对历史和文本的真正释读之中。

这种问题意识的具体性，也表现在本书其他各章对不同的研究对象的讨论中。比如第五章《梁山丁：多重关系中的地方风物》以沦陷区作家梁山丁最受评论界关注的长篇小说《绿色的谷》为核心文本，揭示出梁山丁将笔下狼沟的地方风物放置在都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富人与穷人的阶级冲突以及中日民族矛盾等一系列关系网络中，使其意义在现代性、阶级性以及民族性的多重价值维度中显得芜杂而含混。这也解决了我阅读《绿色的谷》时一度产生的在历史和价值间难以决断的困扰，同时也解释了何以后来的文学批评者和中美日等不同国别的文学史家在这部小说中均能投射各种价值面向、文化姿态乃至政治立场：梁山丁“在小说中极力刻画的地方风物，是一块意义含混的处女地，可以供人以各种价值尺度随意地涂抹与装饰”。由此也凸显了地方性因素对于沦陷区文学的特殊的意义，“因为地方风光、地域风俗等极具地方色彩的事物，是一个被多种价值标准相互争夺的含混场域。作家正可以通过对地方色彩的

书写与表现，利用其含混性放置那些在沦陷区试图说出，但又不敢明言的东西”。而在第六章《师陀：地方作为心灵的投影》中，作者则另辟蹊径，试图揭示师陀对故乡河南独具特色的地方风景的描绘，似乎只是他在20世纪40年代迷惘、无助的内心情绪的外在化。“也就是说，在沦陷区，文学的地方性特征未必仅仅被用来帮助作家表达种种不便明言的思考，它也可能在那些因苦闷贫病变得意志消沉的作家那里成为心灵世界的镜像。”

这些具体化的论断，都呈现的是历史以及创作的丰富性和差异性所在，也揭示了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文学越来越受到研究者重视的原因。对地域差异性的关注，也使得本书对几位代表性作家的分析，展示出不同地域的小说家具有差异性的目的与诉求，以及对地方风物进行书写与描绘的各自所固有的独特性，有助于进一步丰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图景。因此，我赞赏松睿在本书结语中的判断：“或许我们可以说，正是地方性特征在文学作品所具有的潜力，为不同区域的小说家在不同路径上的写作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而作家们在创作实践中所进行的多重尝试，也让地方性特征对于文学的意义变得丰富多彩。”这些丰富多彩的面向，不仅仅为文学史提供了地方性风貌的差异性存在，也意味着文学史书写应当直面差异性的历史本身，从而才能超越本质论的历史迷障，真正还原文学史的原初面貌。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本书也提供着关于文学研究怎样回归历史的原初语境的可资借鉴的方法论内涵。

松睿有比较丰沛的文学感受力，又擅长对文本进行精细的分析。因此，在对相关的文学历史进行整体性描述的同时，本书同样引人注目的正是对作家的体贴，对文本的感悟，对小说形式堪称精到的分析。这些特点与松睿的理论视野有效地结合起来，使我们看到一个文学素养全面而均衡的青年学者已然崭露头角。我也很欣喜

地看到，松睿通过这部博士论文的写作，开始成为自觉的学者，并显示出自己的渐成风格的研究品性。近来，他所涉猎的研究领域也开始丰富多彩，影视批评、艺术评论、外国文学研究，都正在成为他关注的领域。而这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著，奠定的是松睿进入历史、同时进入作家的心灵和文本世界的坚实的基础。作为他硕士生和博士生阶段长达七年的导师，我衷心祝愿松睿在成为一个有创造力的自为的学者的路途中越走越远。

2016年1月31日于京北上地以东

目 录

1 序言 / 吴晓东

1 导论

1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问题意识

18 第二节 研究现状

34 第三节 研究方法 with 论述结构

46 第一章 地方性问题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文坛

49 第一节 地方性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

63 第二节 地方性与民族主义文艺

71 第三节 地方性与京派文学

83 第二章 20 世纪 40 年代关于地方性问题的理论思考

86 第一节 地方、民族与世界

104 第二节 地方性与知识分子改造

114 第三节 地方性与真实的生活表现

131 **第三章 地方书写与国族叙述：以老舍的小说创作为中心**

132 第一节 “失而复得”的地方性特征

141 第二节 个人与国家

149 第三节 抽象意义的寻求

155 第四节 地方性：中华民族的表征

165 **第四章 地方性与解放区文学**

166 第一节 赵树理、地方性与认知“装置”

179 第二节 文学语言与地方性的呈现

217 第三节 人物形象与地方性的显隐

237 **第五章 梁山丁：多重关系中的地方风物**

240 第一节 命运多舛的小说

251 第二节 乡土的爱恋与迷惘的情绪

256 第三节 二元结构中的“土地”

267 **第六章 师陀：地方作为心灵的投影**

269 第一节 “故乡—异乡” 双线叙述

280 第二节 “时间”“命运”与“衰败”

290 第三节 迷失在荒凉的旷野

298 **结语**

307 **附录 政治意识与小说形式**

——论卞之琳的《山山水水》

330 **参考文献**

349 **后记**

导 论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问题意识

20 世纪 40 年代^[1] 在中国现代史上极为关键,研究者往往采用诸如“转折年代”或“转折的时代”^[2] 等短语来指称这一时期。在某种程度上,以“转折”一词来描述这个被战争笼罩的时代的确颇为恰当。一方面,抗日战争被看作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彻底打败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标志着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改变;另一方面,国共两党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则被视为中华民族两种不同的前途和命运之间的对决。可以说,20 世纪后半段

[1] 20 世纪 40 年代本来指的是 1940 年 1 月至 1949 年 12 月这段时间。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两个历史事件,对于其发展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一方面为了更好地表述研究对象的特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论述的便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所使用的 20 世纪 40 年代或“第三个十年”,通常是指“七七”事变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段。本书也同样以这种方式使用 20 世纪 40 年代一词。

[2] 这两个称呼分别来自金冲及的《转折年代——中国的 1947 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年版)和贺桂梅的《转折的时代——40 ~ 50 年代作家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中国社会的发展走向，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这一时期被最终确定下来的。

这样一个转折、动荡的年代对中国社会的冲击更是极为剧烈。全民战争所要求的大规模战争动员和宣传、兵燹摧残下国土的撕裂与分割，使得每个中国人被迫卷入其中，必须去直面战争并做出自己的选择。而被“民族革命的风暴”“冲击震荡得特别厉害的一群特别的人——作家、艺术家”^[1]，则更是与抗日战争紧紧地纠缠在一起。正像一位文学评论家在 20 世纪 40 年代发出的感慨：“中国的现实生活整个地起了剧烈的变化，在抗战的舞台上，作者离开了都市亭子间式的平板生活，走上了战斗的征途，逐渐与广大的人民生活碰了头，合了流，打成一片了。作者在战场上，他可以深深地体验到，一个古老的民族如何在抗战的熔炉里逐渐地新生了。”^[2]这段论述虽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早已成为描述作家、艺术家受到抗日战争影响的“陈词滥调”，但却非常清晰地呈现了这场战争对作家生活环境的巨大冲击。在这个意义上，20 世纪 40 年代可以被看作是作家、知识分子生命历程中的某种创伤性体验，它简单粗暴地斩断了他们与过去生活的联系，迫使他们承受其带来的痛苦和变动，并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与生活的断裂和变化相对应的，是作家、知识分子开始对文学自身产生了全新的理解。也就是说，人们开始不约而同地从各自的知识背景、政治立场出发，展开对“五四”新文学的反思，并期待着某种新型文学的诞生。虽然自 20 世纪 20 年代末左翼文学思潮兴

[1] 周扬：《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载《解放周刊》第 42 期，1938 年 6 月 8 日。

[2] 臧云远语。参见《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文学月报》第 1 卷第 5 期，1940 年 5 月 15 日。

起以来，对“五四”新文学的批判和反思就已经不断出现，表明部分作家、批评家开始在新的思想脉络和问题意识下思考文学问题。然而，无论是从影响的广泛程度上看，还是从反思的深刻性来看，人们在20世纪40年代对“五四”新文学的批判都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几乎从抗日战争刚刚全面爆发时开始，作家、批评家就从文艺大众化的角度论及在战争状态下超越“五四”新文学的重要意义。例如，王元化就指出：“我们不能不承认五四启蒙运动的不彻底，新文化运动只徘徊在少数知识分子和小市民的圈子当中，而同大众始终是割离的。把这个问题放到现阶段（指抗日战争初期——引案）上来求完满的解决，实是刻不容缓的急务了。”^[1]周扬在这一时期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认为“中国的新文学创作差不多都是欧化的，近几年来技术的水准的确是大大提高了，但是同时我们不能否认这些在技术上优秀的作品的基本读者，还只限于狭小的知识分子学生的阶层。欧化的文字技巧在作者和落后的读者中间筑起了一道障壁。在今天，急需要把民族革命的思想普遍到最广泛的群众中间去的时候，这个障壁，就应当用种种方法来打破”^[2]。而林淡秋则更是以阶级分析的方式，对“五四”新文学进行严厉批判：

作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开端的“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主要地是由于半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游移性，不能坚决地领导大众实践反封建反帝的任务）。始终停留在少数名流学者的圈子里，没有

[1] 洛蚀文（王元化）：《论抗战文艺的新启蒙意义》，载洛蚀文编：《抗战文艺论集》，文缘出版社1939年版，第61页。

[2] 周扬：《抗战时期的文学》，《自由中国》创刊号，1938年4月1日。

向大众的队伍扩展。运动的领导者简直忘记了大众（也许看不起大众，也许害怕大众），始终没有想到把大众与“文学革命”联系起来。〔1〕

显然，20世纪40年代的战争状态让这些批评家越发注重文艺作品动员广大底层人民参与抗战的力量，使他们深感“五四”新文学受众狭小、难以为普通民众理解的弊病，因而以激烈的方式展开对它的批判。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抗战初期的文艺理论家往往从文艺大众化的角度反思“五四”新文学的局限性，但由于他们并没有提出实现新文学大众化的具体方案，因而其讨论多少显得有些空泛。而到了随后出现的文艺的“民族形式”论争中，作家、批评家则开始将对“五四”新文学的批判与所谓中华民族自身特有的作风、气派联系起来，使讨论变得更为具体、深入。例如，宗琰在反思“五四”新文学时就认为：“‘五四’运动底光辉的成果，是打破了旧文学形式的束缚，而接受了外来的西洋文学的影响……一些作家往往忽略了吸收旧文学的传统中底优秀的描写方法这些问题，因而有时候在他们所刻画的人物底思想故事中，大抵缺乏一种深厚的中国人所特有的气息，和活生生的现实。”〔2〕而潘梓年在批评“五四”新文学时，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那时候的新文艺，因为作家大都是与广大群众的现实生活或多或少地隔离着的小资产者知识分子并没有从中国社会的实生活中孕育出来，而是从模仿西洋文学而

〔1〕 林淡秋：《抗战文学与大众化问题》，载洛蚀文编：《抗战文艺论集》，文缘出版社1939年版，第157页。

〔2〕 宗琰：《文艺之民族形式问题的展开》，载（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1939年12月12日。